

台灣文學年鑑的回顧與展望

沈俊翔

一、前言

從1996年算起，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已堂堂邁入第十年。所謂「年鑑」乃是透過有系統地匯集、整理上一年度的所有活動和文獻訊息，然後逐年編纂出版。這是一個將資料客觀呈現與不斷累積史料的工作。過去九年，台灣文學年鑑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文建會）和國家台灣文學館（以下簡稱文學館）的支持與推動下，逐年編纂連續出版之後，我們確實看到了一些成果。可以想見的是，多年以後，台灣文學年鑑中的大事記就是台灣文學大事記，年鑑中的書目就是台灣文學書目，年鑑中的論文索引就是台灣文學論文索引，而年鑑中的綜述文章匯集起來就是小型的台灣文學史。換句話說，年鑑的價值與意義不單是「工具書」而已，更是建構台灣文學史的基礎所在。

然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工作，卻因台灣政治、社會環境的更迭，以及台灣主體意識的抬頭，致使編輯執行單位一再變換。回顧過去九本台灣文學年鑑，乃分別由文訊雜誌社、前瞻公關公司與靜宜大學以接力賽的形式，一棒接著一棒，陸續完成了從1996至2004年的台灣文學年鑑。也許各自有不同的理念與立場，但不同階段不同編輯者所累積下來的成果，都應該被肯定。不過，也因編輯者的不同，其對於台灣文學年鑑的定位，編輯立場、方式及體例，自然大不相同。底下我們不妨回

顧其編纂歷程，並比較其差異。

二、台灣文學年鑑的三個階段

在台灣，柏楊（郭衣洞）當是最早提倡和堅持編寫文學年鑑，並且親身實踐的第一人，他分別於1966年和1967年主編並出版《一九六六中國文藝年鑑》及《一九六七中國文藝年鑑》。前者記錄中國近十六年間的文藝事業發展、工作成果、重大活動、文藝社團組織概況、文藝界重大事件等；後者則記錄了1967年一年間所發生的文藝活動，並補充前一年年鑑不足的資料。誠如彭品光在《一九六六中國文藝年鑑》的編後記中指出，在台灣此事「因事屬創舉，一切均乏先例」的情況下，以開路先鋒的精神進行編撰。柏楊一千人的遠識與果敢，儼然為台灣文學史留下最佳的見證與記錄。不過，因著1968至1977年的牢獄之災，柏楊逐年編纂連續出版文學年鑑的理想被迫中斷了十幾年，直到1982年才又完成《1980中華民國文學年鑑》。不同於先前兩本「文藝」年鑑，本書除了從原本含括「文學藝術」的範疇，在考慮「美術」、「音樂」、「舞蹈」、「攝影」均有專業年鑑或專刊的情況下，直接改以「文學」為年鑑編撰的範疇外，本書的架構也成為90年代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編纂時的重要參考對象。嚴格說來，在台灣專屬於文學的「文學年鑑」至此才真正誕生。而且據了解，《1980中華民國文學年鑑》出版後，1981年的文學年

鑑編纂工作也已接近完成階段，卻因沒有出版社願意支持，在經費無以為繼的情況下，柏楊的「年鑑夢」再度落空，而這一中斷又是十餘年。

直到1995年10月，張錦郎先生在一場「面對台灣文學」的座談會上，發表〈台灣文學需要什麼樣的工具書？〉一文，才又重新引起文學界及政府機關對於編纂文學工具書的重視，而被定位為資料性工具書的年鑑，自然成為焦點話題之一。隔年7月，文建會召開「編纂台灣現代文學工具書」的研商會議，與會者體認年鑑實為一史料累積與建構文學史的基礎，認為文學年鑑之編纂有其迫切性與重要性，應即刻著手進行，並推薦由當時具有相當經驗與技術條件的文訊雜誌社執行。爾後，文建會亦正式委託文訊雜誌社進行《1996台灣文學年鑑》的編纂工作。1997年7月，第一本以「台灣文學」命名的文學年鑑終於出版。

文訊雜誌社在專家學者的期待聲中，接下台灣文學資／史料的積累工作，並且連續完成從1996至1999台灣文學年鑑的編輯。文訊雜誌社的工作團隊由李瑞騰總策劃，封德屏擔任總編輯，一方面憑藉長期累積的豐富的文學資源，一方面結合學界的力量，加上「必須做得一年比一年好」的毅力與責任，不負所託地達成階段性任務。在其編纂年鑑的過程中，可以看到文訊雜誌社的編纂理念與做事態度，以及年鑑內容逐年豐富的狀況。然隨著台灣政治環境的紛擾與更迭，文訊雜誌社因曾隸屬國民黨，政府採購法在「去政治化」的考量之下，文訊雜誌社接受委託編纂台灣文學年鑑的工作，不得不宣告中止。

這一停頓，不但失去了2000年資料蒐集的最佳時機，而且差一點又讓文學年鑑逐年出版的理想中斷。直到2001年下半年，文建會始重新委外招標，結果由前瞻公關公司承接了《2000台灣文學年鑑》的編纂工作。該團隊是由杜十三擔任總策劃，由白靈、須文蔚、楊樹清、陳文發、鄭珍、林德俊、陳靜瑋分別擔任評論、網路、採訪、攝影、美術、編輯、資料各組的主編。然因前瞻公關公司為一民間營利公司，於年鑑編輯乃屬外行，尤其在時間倉促的情況下，以及臨時組織的編輯團隊，成員各有正業，如何相互配合協調以達共識都是難事，其編輯的品質可想而知，也必定難如人意。

2002年夏天，靜宜大學本著「對台灣文學的使命感，轉換成實踐的行動，勇於接下半年鑑編輯的挑戰」，於是在經過公開招標的行政程序之後，順利地承接了文建會的委託，進行2001和2002年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工作。2003年10月，文學館成立開館後，文建會將此項業務移交文學館負責，而2003和2004年的台灣文學年鑑亦仍由文學館委託靜宜大學繼續執行。靜宜的工作團隊是由鄭邦鎮擔任總策劃，彭瑞金擔任總編輯，結合中文和台文兩個系所的資源，由老師帶領靜宜、東海、中興幾個學校的大學生和研究生，在「做中學」的過程裡，彼此教學相長。不過，相較於文訊雜誌社長期以來即留意並蒐集整理文學資料，這項編纂工作對於靜宜團隊而言，無疑是陌生且具挑戰性的任務，尤其在2002年才回頭蒐集整理《2001台灣文學年鑑》，其倉促可以想見。然其憑著對台灣文學的熱忱與堅持，一切從零開始，逐步累積前進，亦不負所託地

完成了四年的年鑑編纂工作。綜觀2001到2004年靜宜團隊的編纂成績，他們逐年調整其架構與定位的結果，立場也在調整當中越見鮮明，此正可看出靜宜團隊所累積的經驗軌跡，以及彰顯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堅持。

儘管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工作，歷經種種波折，且隨著三個不同編輯單位，定位與立場不斷變換，但每個編輯單位都在逐步摸索的過程裡，為台灣文學史留下了真實的記錄與見證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
三、台灣文學年鑑的規範化編纂

所謂「架構」(Framework)原是建築工程的用語，指的是樑和柱聯結而成的結構。後來「架構」一詞被援引進入現代工具書特別是百科全書的編纂，用以指稱全書由各個基本組成單位有機地聯結而成的總體。所謂百科全書的基本組成指的是「條目」，而年鑑的基本單位則是「欄目」。由此可見，「欄目」之於年鑑，以及「架構」之於年鑑的重要性。換言之，什麼樣的架構決定什麼樣的年鑑面貌，一旦架構鬆散、眉目不清，那麼，年鑑的價值與可參考性便有了問題。

回顧過去九本台灣文學年鑑的架構，其設計規劃的理念大多是以文學的人、事、物三者為主軸，然後輔以工具書應具備的條件為設計考量。然不同編輯單位，其架構的規劃，卻有極大差異。

首先以文訊雜誌社為例。《1996台灣文學年鑑》原分為「概述」、「記事」、「人物」、「作品」、「名錄」、「附錄」六項，到了1997年時，除了加入

了「圖片目錄」外，其中「概述」一項，接受編輯顧問張錦郎先生的建議，改稱「綜述」。到了1998年時，為了提供讀者更方便的檢索功能，更完成「索引」的編製。至此，台灣文學年鑑的架構才算大致底定。內容方面則逐年地調整、擴充，從1996年八篇「概述」文章，增加為1997年的15篇「綜述」、1998年的14篇以及1999年的18篇。其觀察涵蓋的面向則從原本的小說、散文、新詩，擴展至兒童文學、古典文學、網路文學、古典詩等領域，再延伸到中書外譯、比較文學，甚至將觸角擴及中國大陸、日本、美國等地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現況。除了戲劇四年來均未曾納入以外，盡可能全面地蒐羅、整理任何與台灣文學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創作與研究動態。而特寫文學人、文學事、文學書三個部分，則透過每年開放性的票選活動，或者在參考國內眾多書店及報章的票選結果之後，再由學者專家進一步篩選決議，選出當年度值得關注的文學人、事、書加以報導。這樣的方法，實際上也成為其他編輯單位參考及沿用的模式。另外，「人物」部分還針對辭世作家整理其小傳，並簡要的評論其人和作品特色；「作品」部分，則由1996年「文學書分類目錄」、「刊物發表作品選目」、「評論文章選目」、「得獎作品目錄」，到1997年增加「兒童文學書目錄」，1998年又增加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著書目」及「台灣文學研究博碩士論文分類提要」；名錄部分則收錄「文學社團」、「現代文學課程」、「學術會議」、「傳播媒體」等機構的基本資料及活動舉辦的時間、地點等資訊。凡此種種，都看出文訊雜誌社為充實年鑑內容上的努力。

若平心而論，文訊雜誌社所編纂的台灣文學年鑑，其架構雖然每年修補，但相較於其他編輯單位，卻是相對地穩定，其中尤以《1996台灣文學年鑑》算是最為關鍵性的一年，不但開啟台灣文學年鑑建構台灣文學史的開始，其架構更成為往後每年編纂台灣文學年鑑時沿用的基礎模式。

前瞻公關公司雖然只進行《2000台灣文學年鑑》的編纂，但卻引起最多的質疑與批評。編者聲稱《2000台灣文學年鑑》的體例架構大體承襲1999年版，追求延續性之餘，也做適度地調整、延展和突破。此外，編輯團隊不但勇於挑戰傳統，質疑並試圖擺脫年鑑的工具書屬性，甚至以「既然再怎麼編都難以面面俱到，年鑑的編輯思考何妨大膽地走向特色的追求，甚至連美術設計都是年鑑風格的表現舞台」作為編輯年鑑的立場，其目的是要呈現「另一種台灣文學年鑑的可能」。然而，當實際比較《1999台灣文學年鑑》和《2000台灣文學年鑑》之後，不僅架構上有很大差異，其立場與觀點更是迥然不同。譬如在「作品」欄目之外，何以增加「著作」一項？編者如何區分「作品」與「著作」之差異？標準是否統一？又「網路文學」相對於「傳統文學」雖是載體不同、呈現形式不同，仍不脫文學人、事、物（作品）的思維範疇。因此「網路文學」是否需要另立一項而不破壞原有的分類原則？均是工作團隊應進一步思考與規劃之處。

質言之，《2000台灣文學年鑑》在架構上的調整、變動，筆者很難理解其中合理的邏輯思考，遑論對於過去年鑑的延展與突破。該團隊的立意與用心雖好，然

筆者以為，年鑑既為建構文學史的基礎，其資料性工具書的屬性，殆無疑義。且年鑑作為斷代史料之整理記錄，以呈現歷史之軌跡，因此編纂時應特別著重資料、文獻之真實與客觀呈現，尤其年鑑本有其一定的架構與模式，編纂時應求規範化，絕對不能隨著個人主觀喜好來決定編輯形式或內容，否則年鑑作為基礎史料或工具書之價值便大打折扣。綜觀前瞻公關公司的編輯工作，雖匯集、延攬來自各領域之專業人才，但彼此間卻未能有機地組織、溝通、協調，以致實際的年鑑編務上，失誤連連。尤其，審稿制度的疏忽，導致資料錯誤甚多，而「抄襲」事件的發生，也更加凸顯落實審查機制與最後通讀的重要。

至於靜宜團隊所編纂的年鑑，情況又是如何？與過去有何差別？如何調整或改變呢？首先是《2001台灣文學年鑑》，其架構主要分為「文學大事紀」、「綜述」、「人物」、「出版」、「名錄」、「索引」六項，大體上乃沿襲文訊雜誌社過去的經驗，並做了改變。其中不同之處，主要在於欄目名稱及順序的改變，亦即按時間順序逐日逐月記錄文學動態的「記事」，靜宜團隊改稱「文學大事紀」；整理文學作品發表與出版資訊的「作品」一欄則改為「出版」；再其次則將原置於「綜述」之後的「記事」（文學大事紀），改置於「綜述」之後。而這樣些微的改變，其實可看出兩個工作團隊對於「記事」（文學大事紀），在年鑑工具書中的功能、屬性的認知差異。

不過，其中最大的不同，更在於彼此對於「綜述」的理解與定位。文訊雜誌社團隊主要是針對一年裡面各文學領域，舉

凡新詩、小說、散文、兒童文學、網路文學、古典文學，進行觀察、記述，甚至含括國內外在台灣文學方面的研究狀況；而靜宜團隊則傾向以一年內顯著而突出的文學現象或文學議題，然後以專題論文的形式進行評論、分析與檢討。其實，作為架構年鑑的基本欄目，何謂「綜述」？世界各國早已有相關的論述與規範，並非是編輯單位的主觀認知和定義。所謂「綜述」即取「綜括記述」之意，即概括地反映一個地區、學科、部門、行業的基本情況及發展全貌，或生活中某方面的重要情況。筆者以為「綜述」應秉持「述而不論」的原則，若真要對於某些文學現象或議題進行論述時，也許以「特稿」或「專題」的形式呈現，可能是較好的方式。換言之，以年鑑的工具書屬性，以及作為史料累積的觀點來看，「綜述」部分如同其他資料性的欄目一樣，應避免太多「主觀」觀點的介入較為恰當。不過，一年當中出版的文學書籍、發表的作品、舉辦的文學活動及發生的文學事件何其多而複雜，限於版面要求，如何進行資料篩選便是一大考驗，而且一旦有了選擇的過程，便涉及了主觀的好惡評斷，因此要求全然客觀顯然是不可能的事，然如何降低個人主觀對於年鑑編纂的影響，卻是編輯者應思考和努力的方向。年鑑參考價值的高低，其實決定於主觀價值的介入多寡，越是做到客觀呈現，則其作為史料的價值也就越高。

依據筆者的觀察，2001到2003年的編纂過程，靜宜團隊必然接收了來自各界關心台灣文學年鑑者的壓力與建言，因此在《2004台灣文學年鑑》的規劃上，迥異於過去3年「文學大事紀」、「綜述」、「人物」、「出版」、「名錄」與「索

引」的架構模式，而有了重大的改變，亦即「人物」一欄被併入「綜述」之中，且「綜述」內容也由專題論述改為各文類現況的觀察，包括「小說」、「新詩」、「散文」、「兒童文學」、「民間文學」、「戲劇」以及「文學出版」之概況描述等。而「出版」一欄也改變名稱為「文學資訊」，原列於「名錄」項下的資料，如「台灣文學相關課程及教師」、「台灣文學博碩士論文題目」、「台灣文學學術會議」、「台灣文學獎名錄」、「台灣文學文藝營隊」等，在2004年時皆移到了「文學資訊」項下。前後改變相當大，令人有一點眼花撩亂。原是「從善如流」的舉動，但成效不如預期，反而困擾了讀者。

靜宜團隊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的企圖心，隨著時間的推進，其理念也越鮮明而強烈，這對於台灣文學主體的彰顯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不過，當從資料性工具書的觀點檢視其成果時，不難發現其架構的不穩定與體例上的不統一，應是該團隊編纂年鑑時可以再努力的方向。不過必須強調的是，體例不統一乃是三個編輯單位共有的通病，只是程度差異的問題。其實，從九年變換三個編輯單位的情況來看，要求體例一致恐怕是不可能的事，而這也凸顯出國內的文化政策總是急就章，以及未能長遠規劃的窘境。一再變換委託單位的結果，必然造成文學資料、經驗及人力資源的不連續現象。雖說自1997年起，每年都有一本台灣文學年鑑的出版，但那也只是編纂過程中成果的一小部份，更多珍貴且未經主觀篩選的文學資料，反而在編輯過程中被排除、忽略。弔詭的是，年鑑原是累積史料的文化工程，但卻在主觀編纂的過程中，有意無意地「遺棄」、「錯

失」了某些珍貴的史料，何嘗不是一件可惜的事？筆者以為，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意義，其實不單是每年一本厚達五百多頁的年鑑出版面世而已，其編纂過程中所累積的經驗、文學史料以及人才培育之種種，才是更值得珍視的文化資產。

透過上述的耙梳，不難發現過去台灣文學年鑑編纂的最大問題，除了體例上普遍不統一之外，更在於各單位之間各憑主觀地認知文學年鑑和編纂文學年鑑，缺乏範式化與規範化的編輯，即使同一單位，不同時間點的編輯方針也大異其趣，這無疑造成長時間連續觀察、比較年鑑的讀者或研究者的不便與困擾。年鑑既是資料性工具書，那麼其體例自然有其一套嚴謹的規範，並非想要怎麼編就可以怎麼編，否則其參考價值便成了問題。質言之，「年鑑」作為史料的建構基礎，秉持客觀呈現的第一步，在於年鑑編纂的規範化，唯有如此，始能避免因不同的人而有主觀形式及架構上的差異。而基於台灣文學年鑑乃是有系統地針對前一年的文學活動做一整體、客觀而翔實的記錄、回顧，並進而提出觀察報告。那麼，如何蒐集資料以達到全面、翔實，恐怕並非任何一個單位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完成，因此成立一常設性的機構長期負責年鑑的編纂的呼籲，便不斷湧現。因為唯有如此，方能克服架構與體例上出現太大的差異，而其史料的整理與更多無形的文化資產，也才能一併獲得完整的累積。

四、台灣文學年鑑的定位思考

當台灣文學年鑑逐年編纂出版之際，也正是「台灣文學」蓬勃發展的時刻，從近十年間，台灣文學系所的普遍設立，以

及「台灣文學研究」成為「顯學」的過程，即可獲得印證。「台灣文學」的「正名」運動，遠在70年代的台灣社會內部已逐漸醞釀，爾後歷經了80年代的抗爭、等待與辯證交鋒之後，才換得了90年代的成果。因此，當1996年拋開「中國文學」而以「台灣文學」為文學年鑑命名時，正是呼應了這一波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的「本土化」風潮的實例。而2003年「國家台灣文學館」的成立與開館營運，更直接宣示了台灣文學「正名」運動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里程碑。

有別於1966和1967的「中國文藝年鑑」及1980的「中華民國文學年鑑」，當我們把名稱訂為「台灣文學年鑑」時，所指到底是「台灣的文學年鑑」？還是「台灣文學的年鑑」？回顧過去九本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的內容，其實不難發現，它是從「台灣的文學年鑑」逐漸走向「台灣文學的年鑑」的定位過程。

文訊雜誌社階段對於台灣文學年鑑的定位，正如總策劃李瑞騰自述，「現在的情況似乎是以台灣文學為主而兼容其他」，也就是說，雖以「台灣文學」做為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的主體部分，但是並未排除中國古典文學、外國文學對於台灣文學的影響，這些領域在台灣的發展狀況，一併被納為編纂台灣文學年鑑時，觀察分析的對象。因此，做為年鑑主體的「綜述」，其內容除了台灣文學之外，中國古典文學、比較文學、中書外譯，甚至連中國大陸作家和作品在台灣的情況都囊括在內。

不過引起爭議的是，1996至1999年的「台灣文學年鑑」，雖以「台灣文學」命名，書中卻仍隨處可見以「現代文學」

指涉或取代「台灣文學」的用法，譬如「現代文學教學概況」、「現代文學評論與研究概況」、「現代文學書分類目錄」、「現代文學報刊發表作品選目」等。這樣的方式，不免引起本土人士的抗議，因為它確實有窄化台灣文學內涵的嫌疑。所謂「台灣文學」，不單只是現當代的文學創作與研究而已，更包含了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和祭儀文學、民間文學、兒童文學，以及古典漢文的書寫等等。因此，這不免讓人聯想編輯者是否仍將「台灣文學」視為「中國文學」的一部份，進而以「現代文學」模糊化台灣文學主體性的疑慮？

不同於文訊雜誌社，靜宜團隊對於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的定位，恰恰相反。如果說文訊雜誌社是以「加法」的概念來編纂台灣文學年鑑，那麼靜宜團隊採取的便是「減法」的概念。彭瑞金在《2003台灣文學年鑑》的總編輯序中，談及年鑑的定位問題時明白的指出，「三年來的『台灣文學年鑑』，我們願意以負責任的態度來表示，我們負責編製的是『台灣文學的年鑑』，我們無力兼顧在台灣的外國文學發展的情形……如果『年鑑』兼顧了在台灣的非台灣文學活動，可能模糊了年鑑編製提昇、推動台灣文學的主要目的，而成為徹底消極的文學記錄。」由此可以看出，靜宜團隊積極建構、凸顯台灣文學主體的企圖心與使命感，然而只見台灣文學，卻不見世界文學及中國文學的現況，是否反而落入了另一種偏狹與孤絕？尤其在「兼顧了在台灣的非台灣文學的活動」，是否便阻礙了台灣文學的推動？「加法」的編纂概念，真的是為了消彌紛爭的消極的文學記錄嗎？恐怕其中待討論與辯證的空間仍多。



圖11 自1997年起面世的《台灣文學年鑑》至今已第十本。(國家台灣文學館提供，溫千瑩攝影)

筆者以為，現今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，台灣文學很難自絕於世界文學的脈動或趨勢之外，換言之，台灣文學不能也不應該處於不知道世界文學，包括中國文學發展的狀態底下。台灣文學年鑑不應該只有台灣，而應該用更開放的角度來定位。「本土化」與「全球化」原可並行不悖，如果為了建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，而摒棄了它與世界，甚至與中國大陸剪不亂理還亂的文化上之「根深蒂固」的糾結，無疑限制了自我拓展視野的機會。換言之，過去為了對抗威權統治以及單一的文化價值，所以必須團結「本土」的力量，尋求發聲的管道，甚至透過強有力的論述進行批判與抗議，以建構台灣本土文化／文學的主體性。然而世界在改變，台灣的政

治、社會情勢也「日新月異」，台灣文學的內涵隨之裂變、增生、重組，其樣貌絕非穩固不變。而台灣文學的研究也是充滿了生命力與創新，尤其與不同學科之間的越界、結盟，在在都顯示台灣文學雖是新興的學科，但卻生氣勃勃，希望無窮。

總而言之，台灣文學應摒棄意識型態的成見，以更寬容的態度，透過對話、交流、觀摩的方式，在立足本土之餘，也有展望世界的雄心。而進行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時，其態度亦然，即強調本土化的同時，切勿因此窄化台灣文學的視野，甚而切斷其與世界交談的機會或空間；相反地，強調「全球化」的視野之際，亦不可忽略扎根本土。文學年鑑限於篇幅，當面對每年龐大的台灣文學的資料時，必須有所篩選、鑑別，當然更不可能將在台灣的外國文學研究、中國文學的發展情況，做一完整的搜錄、整理與記錄，而實際上也無此必要。不過，當面對「非台灣文學的文學活動與研究」，若能從台灣的觀點出發，然後以「綜述」的形式予以概述介紹，那麼既與世界接軌，又不致忽略台灣文學的主體性，豈不美哉？

五、結語：台灣文學年鑑的嶄新階段

在台灣文學年鑑的第一個十年進行回顧的用意，除了有檢討與反省的味道之外，希望透過這樣的檢視以展望未來，並提供往後文學年鑑編纂時好的參考。不可諱言，過去三個階段九本台灣文學年鑑的架構，如前所述，差異甚大，不僅造成彼此間的資料有斷裂與不連續的現象，也使讀者在查詢使用時產生諸多的疑惑，尤其當後來者如欲統整這九本年鑑的成果以建

置年鑑資料庫時，所面臨的困難可以想見。至於體例部分，因涉及較多的細節，本文並未仔細比較探討，不過整體而言，體例不一是過去年鑑編纂時共同的通病，惟不統一的情況有程度上的差別而已。

綜合前文的論述，在資料性工具書屬性的前提下，如何編好一部台灣文學年鑑，其關鍵在於體例的嚴謹規範與訂定。年鑑編纂之前，執事者若能事先有完整而縝密的「工作手冊」訂定，然後確實依訂定之體例執行，那麼可以說年鑑的編纂工作便已完成一半。另外未完成的一半，則涉及文學年鑑的定位與架構規劃的問題。定位清楚後，那麼收錄的範疇與架構，自然也就綱舉目張、眉目清楚了。至於台灣文學年鑑的定位，誠如前面所說，應是以「台灣文學」為主體，並以開放的角度，同步關照中國文學，甚至是外國文學在台灣的研究現況。

自2005年起，台灣文學年鑑進入了另一個嶄新的階段，亦即文學館在經過兩年的營運，這項龐雜而瑣碎的文學史料的累積工程，已由委外辦理的方式改由文學館內部的研究員來執行，雖然未來成績如何，尚有待社會大眾共同檢視，不過筆者對於這樣的改變深具信心，且充滿期待。這樣的樂觀當然與文學館成立兩年多以來，極力推動、辦理台灣文學史料之整理、研究、典藏、展示與推廣教育之成果顯著有著必然的關係。此外，因台灣文學仍處於主體性建構的階段，若能透過此一國家級的文學機構，進行台灣文學資料的全面搜集與整理，絕對要比民間單位因資源不足而苦苦經營更能引發廣大的迴響，所產生的效益也將加倍。筆者亦期待，文

學館以國家級文學機構的位階，為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，不管是架構還是體例的問題，甚至內容及年鑑的定位，都能樹立範式化的標準與品質。那麼，未來如果有民間版之台灣文學年鑑的進行，也將有一個可靠的參照座標。

最後，很慶幸也很欣慰的是，台灣文學年鑑至少已累積了九年的成果，儘管仍有許多可改進的空間，然前人所付出的心血與累積的經驗，無疑都見證了台灣文學的發展，並留下了豐富的記錄。因此，假使每年繼續編纂逐年出版的話，那麼可以肯定的是，台灣文學的內涵與史料將日益豐富，其主體性也將越見鮮明。至於，1996年以前1967年以後空缺的這一塊，如果在文學館一切運作進入正軌之後，行有餘力的情況下，應該回頭補齊，因為這是文學館責無旁貸的責任與使命。

如此一來，從戰後至今的台灣文學史料也就可望完整建立。那麼，建置台灣文學資料庫的理想也將逐步實現，台灣文學年鑑學的建構也指日可期。